

日中交流二千年

〔日〕藤家礼之助 著



D
DH54/02
日 中 交 流 二 千 年

〔日〕藤家礼之助 著

张俊彦 卞立强 译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日 中 交 流 二 千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40 千字

1982 年 12 月第一版 198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统一书号：11209·15 定价：0.65 元

译者前言

中日两国是只隔着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古以来两国人民之间就有着密切的往来。我国先秦时代典籍有关日本的记载比较零散，语焉不详，这里暂且不说。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开始，无论是中国的史籍上、还是其后日本的史籍上，关于两国之间的交流都积累了大量的有文献足征的资料。它们是两国人民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珍贵纪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爬罗剔抉这些浩繁的文献，从中理出线索，系统地回顾长达二千年的两国交流史，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近几十年来，日本的学者做了许多辛勤的努力，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破除了战前的“皇国史观”的禁锢，再加上考古方面的新发现，研究成果盛况空前，涌现了大量的论文，以及专题史、断代史等方面的著作，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对于两千年的交流史，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论述者尚不多见。木宫泰彦在其战前所著的《日中交通史》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修改、充实，在1955年出版了《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这是一本内容翔实的力作，已由胡锡年同志翻译，年前在我国出版。但是，正如译者所指出的：“本书是在战后出版的，特别在再版时（1965年），日本史学界已经十分活跃，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作者未能及时吸取，看来也是一个缺陷。”

我们现在所译的《日中交流二千年》一书，是1977年在日本出版的。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大量综合了截至七十

年代日本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阐发作者本人的见解。作者在写作中所参考的日、朝、中的有关论文、著作近二百种，其中又是以战后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为主。作者藤家礼之助，生于1928年，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现为日本东海大学文学部教授，其专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和日中交流史，除本书外，还著有：《中国前近代史研究》（合著）、《曹魏的典农部屯田的消长》、《西晋的田制与税制》、《西晋诸侯的秩俸》、《中国古代中世社会的考察》、《日中邦交史再研讨》、《日中交流史的一个断面——关于倭之五王与〈记纪〉的记载》等。他还作为“日中关系史访华团”成员，于1980、81年两度来我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在81年访华期间，曾来北京大学作过有关这方面的学术报告。作者写本书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尚未缔结，他在本书的前言中特别表示了希望早日缔结的祈愿，表现了对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热情。

本书不是把两千年来的有关史实细大不捐地尽量罗列堆砌，而是力求把握住主要的线索，结合每个时期两国发展的（以至东北亚的）具体情况来考察当时中日交往的状态，对于日本学术界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一些主要争论，作者一一作了必要的介绍，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因此读来别饶兴趣，也是很有启发的。全书共分十章，每章的末尾都开列了有关的参考文献，对于作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在我们翻译本书过程中，承蒙作者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热情地帮我们查对引文、改正原书印刷上的一些错误，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第一章至第八章由张俊彦翻译，第九、十两章由卞立强翻译，全部译稿由卞立强统校。作者的原注都照原书的

格式附于每章的末尾。译者为了方便我国读者所加的一些注释，则置于正文同页的底行，不再一一注明。限于我们的水平，错译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今年恰逢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纪念。总结历史，展望前程，对于发展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翻译这本书也是表示对这个有意义的日子的一点纪念。

译者

1982年7月

于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

人们常说，我国和中国是隔着一衣带水的同文同种的国家。而且还常常指出，近代一百年的历史虽然主要是对立、对抗和侵略的历史，但是在这之前却有着长达两千年的友好往来的历史。

不过，仔细地研究一下两千年的交流史，中间有时中断，有时还有对抗，而且令人深感兴趣的是，在这些交流和中断的状态中，好似也显示了我国传统的政治素质。另外，我们两国虽说同文同种，但我国的文化在接受中国文化的时候，却往往使接受的对象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接受文化的方式，好似表示了我国文化的特质，这也是令人很感兴趣的。

今天人们都在呼吁应当进一步密切我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一下两千年的交流史的详细经过，这恐怕正好适应了现代的要求。而且从战后这种交流史的现状——断代史虽有过，但通史几乎没有出版过——来看，恐怕应当说，它应该以某种形式问世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但是，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首先，虽说要仔细地回顾一下交流的历史，但连种种应该核实的事实——特别是在古代史方面，还有史料上的制约——往往还弄不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对史料欠缺的部分进行推测，广泛地搜集各家的学说和参考文献加以归纳整理，从中找出确切的历史真实，系统地展现出长达两千年的交流历史，如非相当了不

起的独具慧眼之士，恐怕是不可能办到的。

但我还是自不量力，自认为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其中，在各家的学说发生矛盾时，就根据鄙见大胆地删剔，而且有时还不揣冒昧地陈述了个人的臆说。谨候大方教正，并乞见谅。

这本小书的出版，很多地方有赖于东海大学出版会的加藤千曼树、山本保之介两位先生的鼎力协助。另外，由于鄙人生性疏懒，植松美津子、竹和是江和越川文晴诸君为我承担了整理和誊写杂乱的原稿和资料的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日中交流史完稿之际，我衷心地祝愿当前日中之间最大的悬案，即日中和平条约早日缔结。(1)我深信这个条约的缔结，会大大有助于日中两国的发展，并对亚洲和世界的稳定作出巨大的贡献。这当然是我祈求它早日缔结的原因之一，但不仅如此，还因为我是在战时和战后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的，只要不缔结这个条约，内心里就不能不感到象恶梦一样的过去——包括日中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依然还没有结束。

作 者

1977年7月7日——
芦沟桥事变四十年后的
一个炎热的夏日

(1)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订，同年10月29日在东京互换批准书。

目 录

译者前言

前言

第一章 邦交的开始——倭王与金印…………… (1)

派往乐浪郡的使者 《后汉书》的倭传

金印的发现 国王师升们

第二章 邪马台国——魏使与女王…………… (14)

魏志倭人传 九州说与关西说 对榎说

提出的疑问及山尾说 中国人的地理感觉

向统一国家发展的过程 对松本说的异议

卑弥呼的目的 卑弥呼以后

第三章 倭之五王——横越万里…………… (46)

朝鲜半岛上的角逐 中国的状况 五王

的遣使 关于五王的推断 应神说的再

研讨 要求除正的意义 为什么向南朝

一边倒

第四章 日出处的天子——新兴国家的气概…………… (70)

空白的六世纪 “阿每多利思比孤” 国

书事件 遣隋使的目的 交通路线

四次遣隋使

第五章 遣唐使——异国之士…………… (88)

遣唐使一览表 三条路线 阿倍仲麻吕

圆仁、圆珍、圆载 鉴真

第六章 入宋僧——螻蛄的向往之情…………… (112)

遣唐使废止以后 从唐末到宋 五代时期的交流 与宋的交流 变化的萌芽
入宋僧

第七章 蒙古来袭——夷狄之间的战争…………… (130)

从北宋到南宋 与南宋的贸易 禅僧的交流 蒙古的兴起 文永、弘安之役
和平的交流

第八章 倭寇与勘合船——日中联合的冒险…………… (152)

倭寇的由来 从元到明 日明交涉
勘合船 入明僧 倭寇 文禄、庆长之役

第九章 郑成功父子——唇齿之谊…………… (172)

从明到清 郑成功父子 郑氏家族向日
本乞师 其他的乞师 唇齿之谊 长崎贸易 唐人坊 来日僧等

第十章 最后的决裂——王道与霸道…………… (191)

日本与中国的近代 日清战争 留日学生 中国与日本的志士 二十一条条约
最坏的岁月 架桥的人们 王道与霸道

第一章 邦交的开始

——倭王与金印

派往乐浪郡的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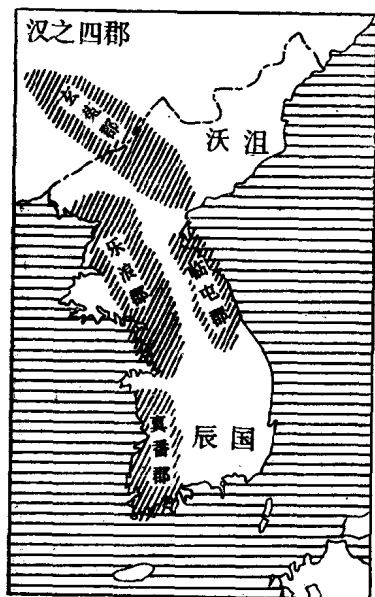
1968年，在华北的满城县（河北省的保定附近）发现了中山靖王的尸体。覆盖尸体的玉衣之华丽，足以使我们大为惊愕。然而接着又在遥远的南方的长沙附近，发掘出轹侯夫人“栩栩如生”的遗体，其皮下组织今天看来还具有弹性；同时在她的身边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遗物。这时就已经不止是惊愕，而且简直可以说使我们目瞪口呆了。

前者中山王是西汉王朝有代表性的皇帝——武帝（公元前140——87年在位）的异母兄弟；后者轹侯夫人一般认为是生活于武帝之前数代的惠帝至前一代的景帝时的一位女性。因而大体来说，他们都是公元前一、二世纪的人物。距今两千多年的那个遥远的国度，从靠近朔风怒号的漠北，直到南蛮缺舌的湖南，乃至更南的地方，当时已由一个高度发达的统一帝国，完成了一个以同一的制度和文化为基调的大一统的体系，这应当说是值得惊异的。在这个时代，在相隔一衣带水的我国，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

几乎是唯一说明当时状况的文字史料，是以下《汉书》（东汉班固撰写的记载西汉一代史实的正史）的《地理志》中所记载的一段话：①“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

来献见云。”

乐浪是武帝统治朝鲜时，于公元前 108 年在那里所设置的四郡之一。所以上面的史料所记载的是在此之后到东汉灭



汉之四郡

亡(公元 8 年)约一个世纪之间的某个时期(大概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后半叶^②)我国的状况。这就是说，记载了十分接近于献侯夫人去世、中山王刘胜殡葬的时代的我国的状况。

尽管文中的“分为百余国”的“百”这个具体数字未必可信，但是据此可知当时我国是处于统一前的小国分立的状态。这一点当然也是同考古学方面的见解相一致的。

我国从绳文式文化的长期缓慢的发展中摆脱出来，

向着使用金属工具和进行水稻种植的弥生式文化的飞跃转变，是在公元前三世纪至二世纪。这种转变必然引起了我国社会生活方面的种种变化。即，发展了以司祭者为中心的集体生活，出现了贫富差别、身分等级和阶级分化；而且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各地的集团之间开始盛行物资的交易；进而作为这些方面综合的结果，各地成立了小规模部落国家。

分散在北九州和关西等各个地方为数众多的遗址，就说

明了上述情况。在谈论有关弥生式文化的金属器具时，经常提及的是铜铎(特别是大而薄型的铜铎)的特异性，以及这种铜铎的分布范围与铜剑、铜铤(特别是细形的)的分布地域之间有着极大的不同。即，铜铎(除去某些例外)是以关西为中心，其西限达到中国地方；另一方面，细形的铜剑、铜铤却集中地出土于北九州，其东界并未抵达关西。

由此而产生了一种见解，认为我国当时有以关西和北九州为中心的、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治圈和文化圈。但是，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意见是起因于一个疑问，即这种形状相当大的薄型铜铎——日本独特的国产青铜器——的原料是从哪里获得的，并在从中国输入的铜器中寻找其答案(即认为是把输入的铜器回炉来制造铜铎)；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就认为北九州和关西并不是互相对立的文化圈，关西方面在当时已经是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先进地区，北九州只不过是它的对外窗口而已。

这些见解上的不一致，涉及到对于后来出现的(公元三世纪的)邪马台国的看法，因此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说它们是互相对立也好，从属也好，唯有一点恐怕确是事实，那就是在当时的我国确实存在着两个形式很不一样的文化圈。

就北九州地区来说，从这个区域出土的输入的青铜利器(与国产的青铜利器不同)，是从私人的坟墓中出土的。

例如，从三云(筑前、怡土)的遗址(瓮棺墓)中，出土了三十五枚输入的铜镜，同时还有铜剑一把、铜戈一把、铜铤两件及其他物品，而从须玖(筑紫、春日)的遗址中，在石墓状的构筑物(由巨石垒成，须玖的巨石成板状，长3.3公尺、

宽 1.8 公尺、厚 30 公分)的地下 3 尺处发现了瓮棺，从那里出土了镜 30 枚左右、青铜利器十几件等。

拿这个须玖遗址来说，在石墓北面的高地上，同时还发现了瓮棺密集的集体墓地。但从这些瓮棺中并未挖出多少陪葬品，挖出的只是铜剑之类，而没有挖出成套的铜剑、玉器、铜镜。

由此可以推知，确实存在着由埋葬于有铜剑、铜镜等作陪葬的瓮棺中的死者(统治者)与受其统治的从属的民众所形成的集团——小的部落国家。据推断，这样的瓮棺墓的遗址大致是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后一世纪的时期的产物。

汉书地理志上的“分为百余国”、“来献见”的小国，恐怕就是这些须玖和三云等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西国⁽¹⁾方面的各国。

而这些小国究竟是单独地、还是组成集团去“献见”，现在全不清楚。但从“以岁时……”的记载来看，大概是选定时间渡海，千里迢迢地把使者派到现在北朝鲜的平壤附近的乐浪郡太守的所在地，献上方物，换取中国和朝鲜所赐予的珍奇物品，然后忻然回国。如果说这是这个时期在东亚出现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汉帝国)的政治影响力的结果，那当然是没有错的。但从我国的那些小国家来说，他们之所以横越万顷波涛，奔向西方，恐怕是出于一种要求从先进国家吸收文化和借献见的形式来进行经济交流的迫切愿望。日中两国的交流，就这样以朝鲜半岛作舞台，揭开了长达两千年历史的序幕。

(1) 关西以西的诸国，特别是指九州地区。在后代也包括中国，四国地区。

《后汉书》的倭传

西汉王朝在持续了二百余年之后，于公元8年被外戚王莽篡夺了国家而灭亡，代之而建立了“新”王朝。但王莽是个复古的理想主义者。他实施的政策，全都事与愿违，引起了赤眉、绿林之乱。不久，这个怪异的理想主义者终于在未央宫的殿台上迎来了他的悲惨的末日。南阳的豪族、汉皇室的远缘血亲——刘秀，从这个混乱的局面中崭露了头角，经他之手在公元25年重建了汉王朝，这就是东汉的第一代皇帝——光武帝。

范曄的《后汉书》是记载东汉时代历史的正史。这部史书与《汉书》有所不同，它首次独立地为我国立了“传”，用六、七百字篇幅作了相当详细的记述。

但是，《后汉书》倭传(准确地说，应是《后汉书》东夷传、倭条)上的记事，从时间上来说，大部分都是来源于记载以后时代历史的《魏志倭人传》，可以说是后者史料的重复，一般认为有相当部分是根据三国时代的记录，而对东汉时代(公元25——220年)的我国情况加以类推或伪造的。因此，作为史料不能轻信。不过，也有一些地方，一般认为是用与《魏志》等不同的独特的史料写成的，所以仍有它的价值。

〔说《后汉书》大部分是依据记述东汉以后时代历史的《魏志倭人传》，是指中国古代的史书往往采取一种非常特殊的编纂方法，即从原始史料的记录和已经写成的史书之类中，根据历史学家的判断而选出其必要的部分，即编撰，然后把它们连贯起来而构成新的史书。这与其说是叙述，不如说是撰述。因此，这并不是说《后汉书》

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只是就《后汉书倭传》而言，其撰者范晔是比《魏志倭人传》的撰者陈寿的时代更后的人（范晔是五世纪、陈寿是三世纪），而其所写对象的时代却反而是汉代，因此，依据记述其后的三国时代历史的《魏志》来撰述的部分，很多地方存在着种种不妥之处。]

而在《后汉书》中，与《魏志》及《魏略》（编纂者：鱼豢。编述较《魏志》略早。据认为陈寿在写《魏志》时参考了《魏略》）等记述三国时代情况的史书毫无关系的独特的部分，有这样一段记录：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 57 年，为光武帝（刘秀）重建东汉王朝之后不久。而那时候倭的“奴”国便派出了使者，带着贡物，来到了万里迢迢的都城洛阳。于是，光武帝把印绶授给了他。

舞台已经不再是设置于朝鲜的派出机构，而是到了都城洛阳。那末，果断地采取了横越万里、直接访问都城的外交政策的奴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呢？

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认为它并不是“倭之奴国”，而是“倭奴国”（《魏志倭人传》的伊都国）。但这里恐怕仍应读作“倭之奴国”。⁽¹⁾ 范晔自己似乎也是这样解释的，只是对它作了一个“倭国之极南界也”的注释，这是他的误解。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一般认为是因为在《魏志倭人传》中有关于两个“奴国”的记载，一个是在北方沿海地带的小国群中比较强大的“奴国”；另一个奴国可能是应写作某

(1) 日文中把《后汉书》中的“倭奴国”，明确译为“倭之奴国”。

某奴国，而把某某脱漏了，也可能是重复出现的国名，也可能是某个同名的异国，虽然无法确定，总之人们认为（也是这么写的）是存在于（南方的）境界尽头的一个小国。不知范晔出于什么原因而采取了这种看法，把它理解为曾向光武帝朝贡的“奴国”。③

应该说，在这样的地方也可以看到《魏志》倭人传所落在《后汉书》倭传上的影子。这些姑且不说。人们会自然地认为，采取这样单独而直接地向都城派遣使者的大胆行动，只有沿海地带先进的十分强盛的国家（据《魏志》记载，距这个时代后两个世纪，奴国的户数是二万户，其它沿海各国是一千户至四千户，可见是个很大的国家）才有可能办到。也可能不是单独派出的使者，而是作为几个国家的代表。如果是这样，那也表明它是对几个国家具有影响的、相当强大的国家。

后来偶然的发现，使这些情况更加清楚了。

金印的发现

江户时代中期，在天明年间的大饥荒的高潮中——1784年2月的某日，发生了一件有名的事。

在现在福冈市东区所属的志贺岛（过去当然是孤立的小岛，现在已由“海中公路”与本土联接了起来）上，黑田藩的农民甚兵卫在修整自己的田地的水渠时，从一块大石头下面发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東西。洗去了泥垢，原来是一方四边平均长2.347公分，重108.729克，缀以蛇纽的金质印章。印面上用隶书刻着：“汉委奴国王”。

历史往往会给人们以不可捉摸的偶然的启示。所谓“金